

“和而不同”何以消解卢卡奇“物化”？ ——基于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批判的双向阐释

周芳元

湖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6年7月3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5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5日

摘 要

资本逻辑的扩张引发了人的异化与物化困境，成为现代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核心命题。卢卡奇以马克思异化理论为基础，结合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提出了“物化”理论，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主导下人的主体性丧失、社会关系异化、生存意义消解的文化困境。然而，卢卡奇将物化的消解寄托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总体性觉醒，过于依赖主体意识的转变，因此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蕴含着整体性思维、差异包容理念与共生智慧，为消解物化困境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本文以卢卡奇物化理论为参照，从资本异化与物化的本质剖析出发，深入挖掘“和而不同”思想的哲学意蕴，系统阐释其消解物化的内在机制，探索传统哲学与现代批判理论的融合路径，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和谐共生的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

物化，和而不同，中国哲学

How Can “Harmony in Diversity” Resolve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 Two-Way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Modern Critical Theory

Fangyuan Zhou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July 25,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logic has given rise to the predicaments of human alienation and reification,

文章引用：周芳元. “和而不同”何以消解卢卡奇“物化”？[J]. 哲学进展, 2026, 15(8): 116-123.

DOI: 10.12677/acpp.2026.158370

making it an unavoidable core issu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Building upon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and integrating it with the realities of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y, Lukács proposed his theory of "reification", which profoundly reveals the cultural dilemmas of modern society—namely, the loss of human subjectivity,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existential meaning—all under the dominanc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owever, Lukács placed the resolution of reification in the total awakening of proletarian class consciousness, re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consequently, his approach faces du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edicament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he er bu tong), developed and transmitted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embodies holistic thinking, the principle of inclusive difference, and wisdom of coexistence, thereby providing unique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resolving the predicament of reification. Taking Lukács's theory of reification as a reference point,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ce of capital alienation and reification, delves deeply into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harmony in diversity",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its internal mechanisms for dissolving reification, and explores pathways for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ith modern critical theory. The ultimate aim is to offer new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s for realizing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for constructing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Reificat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Chinese Philosoph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资本对人的异化、物化扭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人类的一切活动，无论是精神生产还是社会交往，都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1]。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也塑造着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人类历史不仅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史，更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双向互动的历史。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实践客体之中，形成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同时，实践客体也反作用于主体，不断丰富人的本质、提升人的能力，推动人向更全面、更自由的方向发展。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下，物质生产实践达到了高度发达的水平，私有制被消灭，分工不再是束缚人的枷锁，而是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此时，全体人类每个人的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存在压迫与剥削，而是平等、和谐、互助的共同体关系。实践客体，即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不再是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而是满足人的全面需求、确证人的本质价值的载体。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劳动不再是被迫的谋生手段，而是人的有意识的、能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实现自身本质、获得精神满足的重要途径，实践对象化过程呈现出快乐的、幸福的、充满创造性的状态。

然而,随着物质生产的不断发展,私有制的出现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打破了这种理想的实践状态,异化现象随之产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系统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种核心表现[2]:其一,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成为异己的、独立的力量,反过来统治和压迫工人,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就越贫穷;其二,劳动者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本质活动,变成被迫的、外在的、折磨人的谋生手段,工人在劳动中否定自己、感到痛苦;其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退化为单纯的动物式生存,失去了创造性与主体性;其四,人与人相异化,劳动异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对立、敌对的利益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成为最突出的表现。

马克思强调,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与分工的存在,这是经济层面人的异化的核心症结。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极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成熟与普及,经济领域的异化逐步渗透到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形成了更为深度的异化形态。此时,异化不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剥削与压迫,更深入到人的意识层面,异化意识已经蔓延至工人的头脑之中,导致工人的阶级意识模糊、革命性遭到削弱,甚至认同自身的异化状态。

卢卡奇在继承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一步提出了“物化”理论,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推向了新的深度。卢卡奇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已经深入到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各个角落,形成了全面的物化现象,这种物化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关系层面的,需要通过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批判,才能唤醒人的阶级意识与革命性。

卢卡奇指出,发达的商品经济遵循着“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的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3],这种合理化原则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过程,逐步形成和强化了依据商品本性和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机械化体系。这一专门化、理性化的生产体系和社会机制,具有超人的自律性,它不再受人类意志的支配,反而成为支配人类的异己力量。劳动者被整合到这一机械体系之中,成为体系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零件,其劳动被简化为专门的、固定的、机械重复的动作,人被抽象化为可以计算、可以量化的数字,失去了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这种人的抽象化和数字化,是物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与合理化过程中人的抽象化和数字化密切相关的,是主体的客体化现象。在物化逻辑的支配下,人由生产过程和社会历史运动的自由自觉的主体,沦为被动的、消极的客体或追随者。人不再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而是被机械体系、商品逻辑所支配,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与能力。同时,卢卡奇还指出,物化现象还表现为人的原子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每个人都成为孤立的、同质的原子式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简化为商品交换关系,彼此陌生、相互疏离,不再有真正的情感联结与共同体意识。揭示资本主义技术理性通过人的数字化和可计算化、主体客体化与原子化。卢卡奇意在指明的是,商品交换的普遍化不仅重构了社会关系的客观维度,更通过可计算性原则将主体意识工具化,使技术理性成为支配现代人认知的核心意识形态[4]。要理解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完整逻辑,必须首先把握其三个核心维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商品形式、合理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在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判断构成了卢卡奇的出发点。但卢卡奇的创造性贡献在于,他将马克思的商品形式分析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综合。卢卡奇指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全面重塑了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在这一合理化原则的支配下,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抽象的、可计算的、机械重复的局部操作,劳动者的质的特殊性被消解为量的可计算性,时间被空间化,有机的生命过程被切割为同质的、可量化的片段。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深刻揭示了在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主导下,人的主体性缺失、生存意义消解的文化困境。他认为,这种文化领域的物化现象,无法仅仅通过经济层面的变革来解决,必须通过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的阶级意识,打破物化意识对人的束缚,才能实现人的解放。

卢卡奇对物化消解路径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与历史辩证法的论述之中。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彻底消解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层面的变革，更关键的是要打破物化意识对人的精神束缚，唤醒无产阶级对自身作为历史主客体统一体的自觉认知。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无产阶级既是自身劳动力商品化的客体，又是创造全部社会财富的主体；当无产阶级突破物化意识的直接性、非历史性和非实践性特质，意识到自身就是历史进程的创造者时，它便从被动的客体转化为自觉的主体，从而在意识层面扬弃物化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方案本质上是一种“意识革命论”——它认为物化的消解首先且根本上依赖于主体意识的总体性转变。然而，这一方案自提出之日起便面临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困境。卢卡奇将革命成功的希望几乎完全寄托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带有浓厚的主观观念论色彩。哈贝马斯在批评卢卡奇观念论倾向的基础上，将物化问题重新诊断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他认为，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遵循工具理性逻辑，本应服务于生活世界的交往需求；但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逻辑不断扩张，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入侵家庭、教育、文化等属于交往行为的生活世界领域，导致人的意义感、价值共识和主体间性被系统规则所侵蚀。哈贝马斯的贡献在于为物化批判提供了更精细的社会结构分析，避免了卢卡奇陷入意识哲学的危险。然而，他的解决方案——通过重建交往行为的普遍语用学规范，使生活世界恢复对系统的“环绕”地位——也面临着困境。霍耐特也尝试回归卢卡奇的问题意识，通过引入承认理论对物化概念进行重构。在霍耐特看来，物化的本质不是卢卡奇所说的“客观化”本身，而是“承认的遗忘”——人们遗忘了在认知和理性操作之前，原初的实践关系是一种共感且参与的“承认态度”。物化发生在我们将他人甚至自身仅仅当作无感受的客体进行观察和计算的那一刻，其根源在于主体对先在的承认关系的遗忘。霍耐特将物化批判的根基从认知层面下探到社会存有论层面，然而，霍耐特的方案将物化问题收束于主体间承认关系的扭曲与修复，对于“物本身的物化”以及人与自然的物化关系缺乏充分的回应。

在当代社会，物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甚至呈现出更加隐蔽、更加深入的形态。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广泛应用，进一步强化了合理化、机械化的社会体系，人被技术逻辑、数据逻辑所支配，主体性进一步丧失；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中，人被物欲所裹挟，消费成为人的价值追求，人的本质被物所异化；在社会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利益竞争，内卷、内耗成为常态，人际关系的异化进一步加剧。这些物化现象，不仅影响着人的身心健康与自由全面发展，也制约着社会的和谐进步。因此，寻找消解物化困境的路径，成为当代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2. “和而不同”思想对物化的消解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历经数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之一。它发源于先秦时期，经过诸子百家的阐释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涵盖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的完整思想体系，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与生存智慧。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批判中部分理论的虚无化、解构性与悲观主义倾向，“和而不同”思想以其建设性的价值导向、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性的生存智慧，为消解现代社会的物化困境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

“和而不同”思想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架构切入，也不是从承认关系的规范重建出发，而是以“差异－和谐－共生”三位一体的宇宙论和生存论视角，同时回应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物化问题。它既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将物化的解决方案寄托于交往理性的程序化重建，也不像霍耐特那样主要依赖主体间承认的情感性修复，而是从日常的、可操作的层面——在劳动过程中回归生命活动的整体性，在人际交往中践行差异尊重，在人与自然的系统中重申共生智慧——提供了一条更具实践韧性的消解路径。

以卢卡奇物化理论为理论参照，深入剖析“和而不同”思想对物化的消解机制，可以推动传统哲学

的现代转化，也能够实现传统哲学与现代批判理论的双向融合，为解决现代性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路径。

2.1. “和而不同”思想的哲学意蕴

“和而不同”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末期，周太史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5]这一论述是“和而不同”思想的雏形，它明确区分了“和”与“同”的内涵，指出“和”是不同事物相互调和、相互补充，从而产生新事物的过程；而“同”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叠加，无法产生新的生机与活力，最终只会走向消亡。史伯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论断，揭示了宇宙万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差异与和谐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春秋时期，齐国大夫晏婴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通过“和如羹焉”“和如乐焉”的生动比喻，进一步深化了“和”与“同”的辩证关系[6]。晏婴认为，“和”就如同制作羹汤，需要水、火、盐、梅、肉等不同的原料相互调和，才能形成五味俱全、美味可口的羹汤；如果只有一种原料，无论如何叠加，都无法形成真正的美味。同样，“和”也如同演奏音乐，需要五音六律、各种乐器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和谐动听的乐章；如果只有一种音调，就无法构成完整的音乐。晏婴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和”的核心内涵——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不同事物的相互协调、相互成就。孔子在继承史伯、晏婴思想的基础上，将“和而不同”思想上升到伦理层面，在《论语·子路》中明确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这一论述奠定了“和而不同”思想的伦理基础，将其与君子人格、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孔子认为，君子能够尊重他人的差异，在坚持自身原则与立场的基础上，与他人和谐相处；而小人则追求表面的一致，盲目附和他人，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和谐。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不仅是一种处世之道，更是一种价值追求，它强调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在多样中实现和谐。此后，“和而不同”思想经诸子百家的进一步阐释与发展，逐渐丰富完善。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和而不同”思想已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范畴，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三个层面。

(1) 差异的承认与尊重

“和而不同”思想的首要前提，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与个体的差异性，认为差异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态，是实现“和”的基础。无论是自然万物的千姿百态，还是人类社会的多元诉求、不同个体的个性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应以单一标准强求统一，更不应以同质化手段抹杀差异。这种对差异的承认与尊重，打破了“绝对同一”的思维桎梏，肯定了个体与多样性的价值。在宇宙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认为，自然万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天地之间，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草木鸟兽，各有其性、各有其用，彼此差异却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和谐有序的自然生态系统。没有差异，就没有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没有多样性，自然就会陷入僵化与消亡。在社会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承认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这些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是社会丰富性的体现。在人生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尊重个体的个性差异，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天赋、兴趣、追求与价值取向，应尊重每个人的自主选择，不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人，让每个个体都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2) 和谐统一与共生

“和而不同”思想中的“和”，并非简单的调和、妥协或一致，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事物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成就，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与有机的统一。它强调，不同事物之间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实现发展与进步的共生关系。如同音乐需要由不同的音符组成，才能形成和谐动听的乐章；饮食需要由多样的食材调和，才能形成五味俱全的美味；社会需要由不同的个体、不同的群体构成，才能充满生机与活力。“和而不同”所追求的和谐，是一种“和而

不流”“和而有度”的和谐，它既尊重差异，又追求统一；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实现整体的协调性。这种和谐不是静止的、僵化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它能够在差异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产生新的生机与活力，推动事物的发展与进步。在自然层面，“和而不同”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成就，不应以人类为中心，征服、掠夺自然，而应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在社会层面，“和而不同”思想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能够通过相互包容、相互协作，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在文化层面，“和而不同”思想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存，主张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借鉴，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交流中实现发展，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

(3) 整体本位与关系优先

和而不同思想体现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精神传统，体现全人类整体利益[8]。“和而不同”思想以整体为视角，将个体置于整体关系网络之中进行审视，强调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个体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整体的支撑，整体的和谐发展也依赖于个体的合理存在，二者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整体本位与关系优先的思维方式，打破了孤立、片面的个体主义思维，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宇宙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将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任何一个事物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事物的发展，整体的和谐是个体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在社会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将人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认为个体的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都依赖于与他人的协作、与社会的融合，脱离了社会关系，个体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在人生观层面，“和而不同”思想强调个体的价值实现与整体的和谐发展相统一，认为个体应在融入整体、服务整体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为整体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2.2. “和而不同”对异化的消解机制

(1) 以差异和谐观消解异化

物化的重要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疏离。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竞争、冲突、敌视成为社会关系的主流，个体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导致人际关系的异化。而“和而不同”思想所蕴含的差异和谐观，为调和人际对立、重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路径。“和而不同”承认并尊重个体差异、多元价值与多样诉求，认为差异并非冲突的根源，而是和谐的基础。它反对资本逻辑所倡导的绝对同一与强制同化，也摒弃极端对立的思维方式，主张以平等、包容、互信的态度对待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与不同文化。在人际关系中，这意味着尊重他人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不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人；在社会交往中，意味着寻求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交汇点，实现互利共赢、协同发展。从实践层面而言，“和而不同”的差异和谐观，能够有效消解资本逻辑下人与人的利益对立与情感疏离。它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与相互协作，使个体从孤立的“原子式”存在走向相互关联的“共同体”存在。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利益争夺的对手，而是共同发展的伙伴，人际关系从异化的利益关系回归到本真的情感关系、协作关系，最终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从而消解人际异化。

(2) 以生命和谐理念回归劳动本真，消解劳动过程的物化

物化其本质是劳动的自由自觉属性被资本逻辑所扭曲造成深层次文化困境，劳动沦为外在的、强制性的谋生手段。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而“和而不同”思想所蕴含的生命活动理念，与劳动的本真属性高度契合，为回归劳动本真、消解劳动异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和而不同”追求身心和谐、心性和谐，认为人的生命活动应当合乎自身本性与内在理性，而非外在强制与功利化。它强调劳动并非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而是包含精神追求、

价值实现与生命体验的整体性活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不仅能够获得物质报酬，更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精神满足，使劳动成为确证人的本质、丰富生命内涵的重要途径。同时，“和而不同”所倡导的“和”，是劳动过程的和谐与劳动成果的共享。它反对资本逻辑下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劳动成果的私有化与劳动价值的工具化，主张劳动过程应尊重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劳动成果应由劳动者共享。这意味着，在劳动实践中，劳动者能够自主支配劳动过程、自主选择劳动方式，劳动不再是被迫的苦役，而是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劳动成果不再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工具，而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确证，成为劳动者与社会共同发展的物质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劳动异化得以从根源上消解，劳动回归其本真属性。

(3) 以整体观重塑人的存在，消解人的片面化与碎片化异化

物化的首要症结，在于资本逻辑将人拆解为孤立、片面、功利性的个体，使人丧失了整体性存在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人被简化为“经济人”，其全部价值被归结为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社会关系、精神需求、道德品格等均被边缘化，最终导致人的片面化与碎片化。而“和而不同”思想以整体观为核心，为重塑人的整体性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而不同”将人视为天地万物、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整体性存在，而非孤立存在的原子。从宇宙观层面而言，人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天地万物同根同源，人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自然整体的滋养与支撑；从社会观层面而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的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都依赖于与他人的协作、与社会的融合。这种整体本位的思维，打破了资本逻辑对人的片面化定义，使人摆脱“单向度的人”的桎梏，重新回归到具有丰富性、完整性的本真存在。同时，“和而不同”所强调整体观，并非对个体差异的抹杀，而是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它既肯定了个体的独特价值，又强调个体与整体的内在统一，使个体在融入整体的过程中，既实现自身的发展，又为整体的和谐贡献力量。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有效消解资本逻辑带来的人的碎片化存在，使人重新认识自身的整体性价值，摆脱片面化、碎片化的异化困境。

3. 结语

“和而不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以其整体共生、差异统一、和谐共生的核心要义，从人的整体性存在、人际关系的和谐、劳动的本真属性、人与自然的共生等多个维度，为消解现代性社会中的物化困境提供了独具特色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它打破了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虚无化、解构性困境，以建设性的价值导向，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和谐共生的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在资本逻辑依然主导的现代社会，物化问题的消解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引，也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滋养。“和而不同”思想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不仅能够消解异化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更能指导人类在实践中摆脱碎片化、对立化、工具化的生存困境，回归人的本真存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生。未来，我们应进一步推动“和而不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融合，加强对这一思想的当代阐释与创新发展，摒弃其封建糟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借鉴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合理成分，丰富“和而不同”思想的现代内涵，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物化困境。我们要将“和而不同”思想融入社会治理、生态保护、劳动实践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使其成为消解异化、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走出现代性异化的困境，打破资本逻辑与工具理性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待的美好未来，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58.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56-169.

-
- [3]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 孔明安, 王馨雨. 物化逻辑的演变及其当代批判[J]. 学习与探索, 2025(6): 19-27.
 - [5] 左丘明. 国语[M]. 韦昭,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56.
 - [6] 左丘明. 左传[M]. 杜预, 注, 孔颖达, 疏.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423-1424.
 - [7] 孔子. 论语[M]. 杨伯峻,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138.
 - [8] 张晓庆. 和而不同: 儒家共同价值思想的伦理实现[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6): 30-38.